

社科文献论丛第19辑 / 周拴龙主编

反思传统 重识泰山

刘 凌◆著

线装书局

社科文献论丛第 19 辑/周拴龙主编

反思传统 重识泰山

刘 凌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思传统 重识泰山 / 刘凌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0. 1

(社科文献论丛第 19 辑/周拴龙主编)

ISBN 978-7-5120-0048-3

I. ①反… II. ①刘…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②泰山—文化—文集 IV. ①G122-53②K92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9201 号

反思传统 重识泰山

著 者: 刘 凌

责任编辑: 李 琳 孙嘉镇 郑金刚

排版设计: 秋 水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9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8.00 元 (全 10 册)

面向未来，辨析传统

(代序)

刘 凌

这部集子，收录了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撰写的有关传统文化的主要论文。泰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泰山文化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范围，而且具有“中华文化史的局部缩影”（郭沫若语）的性质，因而这方面的论文也一并收入。文章绝大部分曾公开发表，相当一部分曾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也有些至今在网络流传，只有少量未刊稿。文章编排，以内容关联度排序，发表时间、期刊则于文末注明。前半部为传统文化研究。主体部分是儒家思想和儒商文化研究，另有若干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特征，以及文化比较的探讨。后半部是泰山文化研究。内容涉及泰山文化性质、特征，泰山文化的当代弘扬，泰山典故、历史人物，以及泰山学术史等诸多侧面。由于各篇文章在不同时间独立完成，文中可能会有少量内容交叉，此次结集也不作改动。两级标题及重要论点均用黑体标出，以便读者阅读。

笔者高校教学专业是文学。鉴于于学科性质和个人学术兴趣，我的阅读范围比较宽泛，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系里要我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选修课，传统文化作为文论背景当然不可或缺。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更加激发了我的研讨兴趣。作为一个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传统之中，

往往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盲昧。加之种种僵化成说的影响，头脑里积淀了许多成见，也需要清理，重新思考。所谓“反思传统”，就含有反省和接受经验教训之意。笔者在泰山脚下工作生活已有四十多年，泰山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又应邀担任泰山研究会理事，参与一些泰山管理的咨询、论证，和泰山文化的研究工作，因而对泰山文化的兴致益发浓厚。但过去的许多泰山论著，大多是名胜古迹和景观介绍之类文字，对泰山文化的认识每每流于表面，正所谓“有眼不识泰山”。我的思考，则力求将泰山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广阔背景之下，以显其“中华文化史的局部缩影”（郭沫若语）之真相，此即谓“重识泰山”之意。所有这些论述，均力求既有理论深度，又不乏实证案例，并力求上升到民族文化模式高度。

“传统文化”似乎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个内涵多元乃至模糊的词语。仅是“文化”一词，就有多种理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一般有三个基本义：一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为特定时期遗迹遗物综合体；三为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但这都是些日常用法，而非专业和学科用法，它们很难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却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之下，探讨民族整体生存、应对方式，为社会变革提供观念支撑，而并非琐碎的知识论争。这实际上已介入现代文化学范畴，即把文化视为包括价值观、思维情感方式、制度风习在内的民族群体思想行为模式。西方现代文化学，本来就是为适应开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认识异质民族的需要而产生，因此自然把“文化”视为民族的整体标志。拙作基本采取这种“文化”视角，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事象、人物研究，都力求探索他（它）们与民族群体思想行为模式的内在联结。

鄙意以为，传统文化研究，似应划清几个重要界限。一是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界限。前者是过去时的历史形态，后者是古

今贯穿的连续形态。二是观念与行为的界限。许多美好观念，未必化为国人行为和习惯。三是特殊与普遍的界限。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理念，不见得凝成全民性的整体文化模式。实际上，任何民族文化均非绝对整合。即以中国传统文化而论，就可分为官府文化、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三者既有重叠交叉，又各相对独立。由于精英文化留有大量经典文本，对民族文化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研究必然要以它们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但无论如何，它们也不能完全涵盖、代表民族文化。因此，笔者的文化研究，便尽量兼顾到大众和民俗文化，而不是仅在“子曰”、“诗云”里兜圈子。传统文化研究，似应更为关注涵盖全体成员，形成群体行为、风习，乃至构成社会制度的因素。当然，还要看它是否已融入文化传统，或未来是否可能融入文化传统，并作出利弊得失评价。

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割断传统的观点，经不起历史检验。传统文化不是一件旧衣衫，相脱就脱，想穿就穿。对它的取舍，受制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发展就是根据现实需要，不断选择传统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传统的过程。传统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只是根据两岸形势不断改变其流向罢了。说“五四”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也不符合事实。贺麟先生说得好：“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的真面更是显露出来。”当时的文化骁将门，大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至于对儒家的过度批判，那还是后来的事。但即使在极“左”年代，也并未完全“割断传统”。抛弃了儒家，不是又把法家请出来了吗？“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不也是在继承传统吗？可见，文化的“路径依赖”具有普遍性，从无“割断”，只有“选择”，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继承”。而良

好的继承，则是从社会发展内在需求出发，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拙著即力求立足于时代发展，从包括泰山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中“选择”自认为重要的质素，为构建新时代的民族文化提供一点微薄资料。

包括文本阐释在内的任何历史阐释，都必然以阐释者的“先见”（或称“前理解”）作为理论前提，摒弃一切主观性的“纯客观”、“价值中立”并不存在。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有了长足发展，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仍是最具阐释力的理论框架，虽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也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了某些补充和发展。笔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同时也不回避对西方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新学科方法的借鉴。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文化研究者，切不可有意无意躲避这种“纠缠”，使自己“出丑”。因此，笔者的文化研究，就坚持以社会存在尤其以经济、政治关系阐释思想观念，而不是相反；坚持个体行为用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和实践效果予以说明、评价；反对夸大意识形态独立性、文化决定论和“观念”拜物教。当然，不是以理论剪裁事实，而是对史实作具体分析。对古圣先贤，既保有一份温情与敬意，予以同情之理解，又决不迷信和盲目崇拜；而是以历史主义态度和新时代价值观，予以评判、取舍。我们应该牢记鲁迅的教言：“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新文化、新道德的建构，也必须以理顺现实利益关系为基础，合理吸取中外思想资源，而不能仅靠宣传、灌输某种美好的传统理念。立足当代，面向未来，辨析传统，就是拙著的基本宗旨。

笔者服膺熊十力拈出、王元化倡导的“根底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的治学原则。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努力发掘史料，缜

密考证，谨予鉴别、取舍。不过，虽说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材料本身毕竟不会说话。用什么材料说话，能否让它说话，说什么话，还是要靠研究者的识见和“裁断”。是的，“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完全意识到自己”（叔本华），然而，“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我始终认为，人文社科工作者，应该具有必要的现实关切和道义担当，而不应仅做一名知识工匠。古人云：君子所守，当以不自失为贵。儒门志士，就多为“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周敦颐）的践“道”之士。孔子那种“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的坚持精神，更加令人敬佩。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应竭力抵制知行分离、言行不一，二重人格和犬儒主义。学者可以尽力争取一切社会资源支持，但又应保持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决不作权势和金钱附庸。此外，为强化反思历史的洞察力，还需要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力。而决不应无视现实关系和社会矛盾，一头钻到故纸堆里，漂浮在“观念”高空，构造空洞无物的乌托邦。

以上是笔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若干治学理念，是耶非耶，运用如何，均期待读者指教。

呜呼！岁月飘忽，转瞬已届古稀。虽于家于国均无建树，而文化忧思竟难释怀。却又只能以微末之躯，托诸空言，发而为文，每念及此，便悲从中来。拙著不过是这种艰窘求索的蹒跚脚步罢了。仅以区区陋文向师友和读者汇报，并期待严厉批评和中肯教言。我相信，关注民族文化命运的中华魂，将把一切中国心紧紧相连。

刘 凌

己丑年（2009）元宵月明之夜
于岱麓山来居活水斋

目 录

面向未来，辨析传统（代序）	1
---------------------	---

上编 反思传统

“儒士”的诞生与“安贫乐道”	3
汉儒的道义承当	20
“孔颜乐处”，乐在何处	34
儒家“孝”论的时代条件及历史评价	49
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	60
儒家“诚信”特色及其现代转化	72
“路径依赖”与“儒商”精神	85
范蠡致富与“儒商”文化	93
范蠡“止于陶”考辨	102
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	114
“儒商”研究及其问题	125
古代畏水意识与大禹治水	131
“和圣”现象的历史、文化解读	140
“和圣”多元接受点评	151

反思传统 重识泰山

王朝君臣博弈与张良自保智慧·····	158
中国古代天人关系·····	171
最是“天道”不“自由”·····	183
中国文化中的“暴力”倾向·····	195
生死关怀：中西文化的一个比较·····	204
“逆向互补”与“文化错位”·····	214
改革开放与亲情民俗·····	221

下编 重识泰山

名山文化与泰山文化·····	229
论泰山传统文化特色·····	239
“五岳独尊”探源·····	249
泰山文化与齐、鲁文化·····	269
汉代泰山封禅的文化特色·····	280
《五岳真形图》发疑·····	295
竺道爽《橄太山文》的文化意蕴·····	307
泰山“重二”石刻与“风月无边”新解·····	318
泰山“国山”建构的政治烙印·····	325
弘扬泰山精神·····	338
泰山文化研究的多元深化·····	347
附录：泰山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周郅）·····	356
后 记·····	373

上 编

反思传统

“儒士”的诞生与“安贫乐道”

“安贫乐道”，后来又称“孔颜乐处”，是最早由先秦儒家所倡导、标榜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几千年来，对其称扬一直长盛不衰，至今仍在不时被想当然和随意化地继承、弘扬着。为了避免简单化、庸俗化地“古为今用”，浪费或扭曲思想资源，有必要对“安贫乐道”作点正本清源的梳理工作。本文即拟着重谈谈先秦儒家“安贫乐道”观的代表论点、社会根源与时代影响。

一、“安贫乐道”观的代表论点

“安贫乐道”意识，最早体现于《论语》的有关论述。《论语·雍也》载：孔子称赞颜回道：“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便是“安贫乐道”观的源头。由上下文推断，“其”字当是指代“簞食”、“瓢饮”。但宋代理学家程颢另有所解，谓“簞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二程遗书》卷十二）言外之意，“其”字乃指代“道”，亦即“乐道”之意。《论语》中与此相联系的议论还所在多有，兹按原文顺序转录于下。《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又：“子贡

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宪问》：“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谓之士矣。’”又：“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卫灵公》：“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又：“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所有这些议论，都体现出孔子的一种价值选择，即在处理富贵和道义的关系中，更加推重道义原则。其要点包括：把“志于道”作为人生基本方向；不过分追求物质享乐；主张以行道途径致富；摒弃不正当的富贵，等等。此种价值取向，亦为孟、荀等儒师所继承。

在《孟子》一书中，有许多关于“安贫乐道”的言论。《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滕文公下》：“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万章下》：“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告子上》：“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又：“理义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尽心上》：“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又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下》：“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以上种种，

其价值取向，基本同于孔子，同时又有进一步发挥。士“尚志”说，可与孔子“士志于道”论相互发明，也为其立论的前提。“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原则，较之“君子忧道不忧贫”，有着更为宽泛的覆盖。孟子对求富的态度，也较孔子为灵活，但“尚志”的基本立场又毫不动摇。尤为不同的是，孟子将颜回与禹、稷相提并论，透露出儒士自高身价的时代气息；而“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全新命题，则开宋儒“理”、“欲”之辨的先河。其落脚点，则是建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滕文公》）人格。

其后的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如《荀子·修身》指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修身》篇又曰：“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儒效》：“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又曰：“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又谓：“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而“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大略》：“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又：“古人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饔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荀子·尧问》：“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贱，舍富而贫，舍佚而劳，颜色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可见荀子也十分看重道义原则。而将“道”提升到“公义”的高度，主张以“内省”而轻“外物”，凭“道义”而抗“王公”，则是颇具时代特色之创造。又指出，“不可骄”之“正身之士”，乃是“纪纲”、“文章”等文化传统的承担者，更是为儒士确立了使命和荣耀。

对具有普遍和根本意义之“道”的自觉体认和担当，确为儒家的生命和灵魂，如《周礼》所说“儒以道得民”（《天官冢宰》）。其“道”又基本上是“古之道”（《荀子·君道》）、“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体认和担当，又完全是自觉自愿、身心以赴并以此为乐的。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离娄下》），就都是强调这种自为、自主性。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孟子也谓：“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均是在肯定体“道”的感性快乐。即此而论，称其为“乐道”，可谓切中肯綮，并当之无愧。当然，对“道之不行”也难免有“忧”，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而无论是“乐道”还是“忧道”，又无不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因而便问心无愧、心安理得，这也是一种“乐”。所以孔子说：“君子，其未得也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荀子·子道》转引）此即“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之谓乎？以此而论，“志于道”的“士”应该是彻底的乐观主义者。

而“安贫”则是从属于“乐道”的，是说不以贫贱而动摇对“道”的信仰。这并不意味着自甘贫贱、摒弃富贵。相反，“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在有“道”的社会，如果仍处贫贱地位，就只能证明你不是有“道”之人。因此，在儒家那里，“安贫”不是消极的，如后世带有道家倾向的“安贫乐贱”（《后汉书·蔡邕传》）那样。“安贫”与“乐道”相联系，是表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均应忠实于“道”，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不过，无论是孔子，还是孟、荀，当时均未拈出“安贫乐道”一语。此语或首出于《后汉书·韦彪传》，称韦彪“安贫乐道，恬于进取，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此之“安贫乐道”似有消极避世之意，与先秦儒道稍异。但后世既然多以“安贫乐道”称谓儒家“志道”精神，且已约定俗成，拙文也只好姑且从之。

二、“安贫乐道”观的社会根源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在其专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前言》中，曾表示反对把“士”视为“学者——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社会属性决定论”，以及“以决定论来抹煞‘士’的超越性”^[1]。我基本同意这一批评，不过又想略作补充。如西哲所云：“没有什么是可以无端发生的，万物都是有理由的”^[2]。既然“仁以为己任”的超越性，并非极为偶然的个别现象，它就必然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而探求这些条件，也许并不等于“以决定论抹杀‘士’的超越性”。因此，笔者将在下文尝试探讨“安贫乐道”的社会根据。

既然“乐道”是主导性的一面，那么我们的探讨就从这里开始。

先谈客观原因。

一是春秋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催生出一批文化、思想也即“道”的承担者，“儒”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章学诚曾指出：古代“官师政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文史通义·原道中》）。这就是指那种政统、教统和文统合一的“礼乐”文化，儒家所称的“先王之道”。这种文化，为王官所一体承担。但到春秋之际，却出现“礼崩乐坏”局面，使三统出现分化。君王只能忙于搞政治和军事斗争，道德和文化的承担便落到“士”阶层身上，“儒”恰是“士”之重镇。在人类史上，东西方均发